

毛姆《面纱》中凯蒂自我意识的无根性研究

柯贤飞*

(欧洲大学, 塞尔维亚 贝尔格莱德 101501)

摘 要: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的《面纱》常被置于女性成长小说的传统之下解读, 认为女主人公凯蒂在湄潭府的苦难经历中实现了精神的升华与成长。本文以线性叙事为出发点, 提出凯蒂的觉醒实则是反成长的过程。文章通过追述凯蒂自我意识萌芽和发展的过程, 论证了凯蒂的觉醒从外部幻象的破灭开始, 却陷入了内在价值的真空; 她虽然获得了选择的自由, 但又无法承受这种自由带来的重压, 在欲望与理性之间相互撕裂, 暴露出其主体性的脆弱和虚妄。本文结论认为凯蒂的旅程没有导向稳固的自我实现, 而是终结于对存在虚无的清醒认识, 她的成长是未完成的、悖论的。这种“反成长”的叙事, 是毛姆对现代人寻找意义时所遭遇的内心困境的悲观主义发现。

关键词: 自我意识; 存在困境; 毛姆; 《面纱》

一、引言

文学批评界历来习惯于将《面纱》归入“教育小说”或“女性成长小说”的传统类型中加以阐释。在此种阐释路径之下, 小说女主人公凯蒂的湄潭府之行, 被普遍地建构成一场深刻的救赎与启蒙仪式。她离开了香港浮华虚伪的殖民社会, 置身霍乱肆虐的生死场域, 在修道院无私奉献精神的感召下, 好像经历了一次灵魂的洗礼。传统的论点大多将这一过程理解为一條直线向上的人格提升之路, 即一个轻浮附庸的女性, 在苦难之后抛弃旧我, 实现人格完善与精神涅槃^[1]。将小说的结尾视为明确的乐观主义信号, 肯定外部环境对个人内在转变的决定性作用。

但是本文意在质疑并超越这一程式化的解释模式。凯蒂的“觉醒”并不是传统成长故事里导向整合性自我实现的胜利之旅; 相反, 它表现出了一种更为复杂且充满悖论的“反成长”模式^[2]。她心智的开启并未抵达意义的归宿, 反而将自己置于一片存在主义的荒原之中。凯蒂的自我意识像幼苗一样破土而出, 但是它萌发的土壤是由幻灭感、死亡的阴影和价值的真空组成的, 并不能给它提供坚实的生长根基。因此, 觉醒并没有给她带来解放的确定性, 反而让她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存在的虚无、人生追求的虚妄。她的成长轨迹并不是一条向上扬起的曲线, 而是从一种混沌进入另一种更高层次的混沌的循环。

本文将沿一条明确的文本分析路径展开论证: 摒弃宏观的印象式概括, 采用细致的文本细读方法, 紧紧跟随凯蒂自我意识萌芽与发展的几个重要节点——婚姻与婚外情双重幻象的破灭、湄潭府时期在生死观照下的初步自省、返回香港后在欲望与理性之间的再次挣扎, 以及对其未来命运的模糊期待。通过分析各个阶段主人公心理状态的内在矛盾性与认知虚妄性, 试图证明凯蒂的“成长”是未完成的。最终, 通过对这个“反成长”叙事结构的揭示, 本文希望呈现毛姆在冷峻笔触下所隐藏的哲学思考, 即人类在摆脱社会幻象之后, 是否还能、或者如何为自身存在找到意义的深刻悲观主义思考。

作者简介: 柯贤飞 (1999-), 男, 硕士, 研究方向为外国文学研究与应用语言学。

通讯作者: 柯贤飞

二、幻象的破灭与自我的真空

（一）依附性人格的崩塌与觉醒的被动

凯蒂的觉醒，最初的动力不是来自对某种崇高内在自我主动的追寻，而是来自她原来生存方式所依赖的一系列核心幻象的相继崩塌。在到达湄潭府之前，她的整个人格都是对外部的依附，她对爱情的理解是一种浪漫的戏剧化投射，在与查理的关系中，将其视为逃离无趣婚姻的救赎；她对婚姻的看法是一种功利的市场交易，与瓦尔特的婚姻实际上是为了在殖民社会的择偶市场中避免沦为“剩女”的风险；她所参与的社交活动更像是一场场精心的表演，在香港殖民社会的狭小天地里维系着体面与虚荣，这些幻象共同构成了她赖以生存的符号秩序，一个她从未怀疑其真实性的“面纱世界”^[3]。但是查理在私情暴露之后冷酷的背叛，完全打破了爱情的幻象；而瓦尔特以沉默的愤怒和惩罚性的湄潭府之行，揭穿了婚姻作为安全港湾的假面。这一系列外部事件的冲击，并非主动的求索，而是被动的剥夺，让凯蒂第一次直面自己一直回避的、幻象帷幕之后的真实荒漠。她的觉醒自始便带有创伤性与否定性，其动力源于旧世界的崩塌，而非新世界的召唤。

（二）瓦尔特之死与修道院经历的悬置效应

在凯蒂被迫进入的湄潭府这个“极限境遇”里，瓦尔特之死和修道院的见闻成为她精神历程中的两个关键悖论性事件。瓦尔特的死，其意义远不止于一位丈夫的离世，更是凯蒂与旧世界最后一根、也是最深的强制性联结的断裂。瓦尔特既是她的审判者，又是她和过去那种以交易、欺骗为根基的生活方式的联系点。他的离世，使加诸她身上的外在道德审判骤然消失，也让她失去了可憎恨、可恐惧或可祈求原谅的对象，陷入一种无债可偿、无罚可受的茫然境地^[4]。与此同时，修道院是超越世俗苦难的神圣之地，对凯蒂而言，修道院无疑为她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修女们虔诚奉献、无畏赴死，让她见识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神力量，这在某种程度上开阔了她的眼界，促使她开始审视自己过去生活的狭隘。但关键在于，修道院所象征的信仰与绝对奉献，凯蒂始终无法将其真正内化为自身的内在品质。她敬仰它却不能信仰它；她模仿善行却不能从中得到灵魂的救赎与安宁^[5]。两种经历共同产生的悬置效应，便是它们一同摧毁了凯蒂赖以生存的旧有世界（社交虚荣与世俗爱情），却未向她提供一个可安稳栖息的新世界（信仰或崇高的使命感）。她的精神也因此被推向一片真空地带：既无法退回过去，也难以迈向未来，陷入一种失重、迷失方向的存在主义困境。

（三）否定性认知与自我建构的未完成

此阶段凯蒂萌发的自我意识具有显著局限性，其核心特征在于其是一种否定性的认知建构。她的精神成长体现在，能够清晰界定自己不是什么、不爱什么，却无法回答“我是谁”这一根本性的问题^[6]。她清楚自己不再是昔日那个轻浮、虚荣、依附他人眼光而活的“贾斯汀太太的女儿”或“费恩太太”；不喜欢查理，厌恶香港这个虚伪的社交圈，甚至反感那个曾经充满欲望的自己。这种否定性认知是其觉醒进程中必要且重要的一环，这意味着旧有身份已被彻底摒弃。但这种认知模式本质上是被动反应性与解构性的，它虽破除了迷思，却无法建立起新的主体性内核。凯蒂的自我意识宛如一块被清理干净的空地：视野虽开阔，内里却空空如也，缺乏可填充的积极内容。她有了一种批判过去的的能力，但却没有一种面向未来的构想。因此，这一阶段的“成长”是不完整的、是残缺的。它只完成了自我探寻上半程的解构，更重要的是下半程的建构还没有完成。以否定为基调的自我意识，无法为自身存在价值定位，因而难以给内心带来真正的安宁，也为日后的精神反复与更深层次的虚无埋下了伏笔。

三、自由的重负与选择的虚妄

（一）重返故地与欲望的复归

湄潭府经历死亡洗礼与精神初步觉醒后，凯蒂重返香港并与查理再度相遇，这成为她精神历程中一场极具反讽意味的考验。这一场景的设置，并非叙事赘余，而是毛姆精心设计的一处实验场^[7]。当查理的妻子多萝西以殖民社会虚伪的“宽容”与“善意”，将她强行拉回昔日的社交网络并安排她与查理独处时，凯蒂被置于一个高度压缩的时空之中，直面新旧自我的激烈交锋。表面上看，此时的凯蒂已不再是昔日那个沉浸于浪漫幻想的单纯妇人，她洞悉了查理的虚荣、软弱与本质^[8]。但是正因为她清醒，所以后面的行为更具有悲剧性。理智上，她对他已无幻想；但在身体与积习层面，仍存在一种强大的、近乎生理性的引力。她的屈服，并非源于爱情的复苏，而是在承受巨大创伤与压力后，对熟悉且能带来短暂慰藉的旧日习惯的回归。这表明，离开湄潭府后，外界环境的改变加之对查理的认清，并未能够消除根植于其人格结构中的欲望模式与情感依附。

（二）自我的撕裂与自由的重负

凯蒂和查理重逢事件的戏剧性之处并不在于身体再次出轨，而在于此事所揭示出来的巨大内在张力，也就是“行为”与“认知”的彻底割裂。当她“半推半就”地投入到查理的怀抱中时，肉体完成了一次欲望的宣泄；但几乎在同一时刻，她的意识却抽离出来，成为一名冷酷的旁观者与审判者^[9]。其行为中已无往日的激情与甜蜜，唯有对自身的厌恶与蔑视。这种灵与肉的冲突，标志着更为深刻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她拥有了选择的自由，却痛苦地意识到自己无力承载这份自由所带来的重负。存在主义认为，人一旦被抛入自由之中，就必须对自己的每一个选择负责。凯蒂的悲剧在于，她清醒地做出了选择，也清晰地目睹了这一选择如何背叛了自己新生的、追求尊严的道德理想，这种痛苦的自责比任何外在的惩罚都来得更严重^[10]。这说明她的自由成了一个诅咒，成了一个把她撕裂的东西，一端是未被驯服的肉体欲望，另一端是初生的、渴求纯洁统一的自我。二者无法调和，使她陷入了比在湄潭府时更为深重的痛苦与自我否定之中。

（三）觉醒的脆弱与选择的虚妄本质

这一事件有力地印证了凯蒂先前觉醒的脆弱性与不彻底性。它宛如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震碎了她精神大厦的地基，人们才发现这地基原本就建在流沙之上。新生的自我意识，在认知层面虽已对旧有幻象进行了批判，在整合人格、统领本能方面却如此弱小无力。它宛如一位没有实权的君主，无法命令自己的肉体与情感习惯服从。因此，凯蒂的行为并未导向全新的、更高层次的自我统一，而只是可悲地沦为对旧日习惯近乎宿命般的回归。此处的“宿命感”至关重要，它并非指外在的命运安排，而是由长期行为模式积淀而成的内在心理惯性，这种惯性强大到即便已“觉醒”的个体也难以抗拒^[11]。这一回归，已然剥去了自由选择浪漫化外衣，显露出其虚妄本质。对凯蒂而言，在那一刻，真正的“自由”并非体现在顺从欲望的轻车熟路上，而是体现在依循理性与道德理想、克制欲望的艰难能力之中^[12]。她不能行使后一种自由，就证明了她所获得的自由仍然是残缺的、表面的。毛姆通过这一情节冷酷地揭示：看穿生活谎言的第一层面纱，并不足以让人过上真实的生活；揭下面纱之后，人们或许会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片更为费解的荒原，一个仍被过去幽灵所纠缠的、不自由的自我。

四、未完成的成长与存在的回声

小说的结尾并非一个尘埃落定的句点，而是一处充满张力的开放空间，凯蒂对腹中女儿未来的憧憬，是解读其最终精神境遇的钥匙。这幅场景不是母性光辉的简单展示，而是凯蒂经历幻灭与挣扎之后，对自身存在的困境发出的最后的回答。通过分析这一行为背后的缘由

与其哲学意蕴，我们能清晰地察觉到：凯蒂的成长之路并未走向传统意义上的圆满终点，而是在一种更具现代性悲剧色彩的“未完成”状态处止步。

（一）指向他者的救赎投射与存在的转嫁

凯蒂对父亲说：“我要把女儿养大，让她成为一个自由、独立的人。”我将她带到这个世界，爱她、养她，并非为了让她将来嫁给某个男人，从此将自己的一生依附于“他”^[13]。但是把她的精神历程放在一起看，这番慷慨陈词就显露出一种逃避的结构。凯蒂把未能实现的自由、自立的理想全部寄托在未出生的、作为他者的女儿身上。在本质上，就是将建构自身存在意义的艰巨任务，在时间上和对象上进行转嫁。她为无法回答的“我是谁”“我怎样生活”问题找到一个替代性的答案：“我会让我的女儿成为某某样的人”^[13]。这种寄托中固然有真挚的母爱和进步的愿望，但同时它也巧妙地避开了凯蒂对自身当下存在的全部责任。萨特曾言：“人是其所行，而非其所愿。”这里形成了一个尖锐的反讽：凯蒂的“所愿”尽数寄托于未来与他人，而她自身的“所行”在故事落幕时仍处于悬置状态^[14]。她用塑造一个完美的未来人格来救赎自己破碎的过去和迷茫的现在，这本身就说明了其内在的主体性是虚弱和不彻底的。

（二）清醒的痛苦与未完成性的最终确证

凯蒂的最终归宿，不是一条从“愚昧”通往“启蒙”的直线，而是一条从“愚昧的痛”走进了“清醒的痛”。她固然掀开了生活的一层面纱，看透了浪漫爱情的虚妄、世俗婚姻的空洞、殖民社交的虚伪，以及宗教奉献之于她的隔膜^[15]。但是面纱之后，并没有找到可以安身立命的终极答案或者稳固的价值根基。正如她对父亲所言：“我无知、轻浮、没有头脑，这些我都清楚。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光有我之前说的这些是不够的。”这正准确地把握到了她的困境：她清楚地知道不是什么，却仍然困惑于是什么。她的成长是从对自身空虚的困惑开始的，经过一番痛苦的追寻，最终达到的是一种对空虚本身有更深刻、更清醒的认识，从而进入更高阶的困惑之中。这种未完成的成长，正是毛姆对传统成长小说模式最有力的反叛与解构^[16]。小说的结尾，凯蒂走的是通往安宁的道路，但这条路本身是不确定的，安宁是遥远的、永远不可能到达的一个彼岸。她的故事没有闭环，她的自我也没有完成最终的整合。毛姆借此揭示出现代性生存的一则真相：觉醒并不意味着问题的终结，而是更为复杂、严峻的问题的开端。凯蒂的旅程向我们昭示：真正的成长，或许最终并不指向光辉灿烂的自我实现，而只是勇敢直面并接纳那永无完结的人生，在虚无的回音中，继续追寻属于自己、毫无承诺的求索。

五、结论

综观凯蒂自我意识的觉醒历程，她的道路并非通向精神圆满的朝圣之路，而是勾勒出一幅“反成长”的现代性图景：觉醒将其带入更深层的存在困境，自由选择反而暴露了心理惯性的支配与选择的虚妄本质。毛姆借助这一叙事手法，打破了传统成长小说的惯性，融入了一种冷静的哲学思考，生活的本质并非等待揭晓的终极答案，而是令人不安的一片虚无。因此，《面纱》的永恒价值便蕴含于这种毫不妥协的洞察之中：它昭示着，现代人的核心困境并非找不到通向真理的路径，而是必须直面根本不存在现成道路这一事实，在虚无之中依靠自身力量，进行毫无保障的意义建构。

参考文献：

[1] 吕佩爱, 刘慧. 不彻底的女性主体意识建构——毛姆在《彩色面纱》中的女性观[J]. 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4(3): 323-330.

- [2] 康哲. 从空间视角解读《面纱》中凯蒂的人物塑造[J]. 中原文学, 2024(18): 69-71.
- [3] 司徒瑞文. 婚姻的困境——毛姆《面纱》之经典叙事学研究[D]. 中国: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24.
- [4] 胡天, 郝延斌. 论《面纱》中的主体建构[J]. 英语广场, 2025(6): 58-61.
- [5] 李鸣宇. 论毛姆《面纱》中的精神探索[J]. 名作欣赏, 2023(12): 127-132.
- [6] 丁美杰. 论毛姆对中国形象的两极书写——以小说《面纱》为例[J]. 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8(6): 123-126.
- [7] 黄丽娟. 毛姆《彩色的面纱》的跨国现代主义解读[J]. 外国语文, 2022, 38(4): 40-47.
- [8] 梁慧琦. 毛姆《面纱》的叙述学解读[J]. 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7, 29(3): 14-18.
- [9] 高锋. 毛姆小说《面纱》中的爱情悖论和精神救赎[J]. 新疆职业大学学报, 2015, 23(5): 43-45.
- [10] 卢佳润. 《面纱》的跨文化空间解读[J]. 名作欣赏, 2025(3): 149-151.
- [11] 张丹琪, 徐丹. 《面纱》中凯蒂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列斐伏尔空间理论为视角[J]. 英语广场, 2023(8): 60-64.
- [12] 张慧霞. 女权主义下的毛姆《面纱》研究[J]. 中国民族博览, 2022(8): 182-184.
- [13] 李四菊, 谷野平. 女性逆境中自我建构研究——从镜像理论视角解读毛姆《面纱》[J]. 大连大学学报, 2021, 42(4): 36-39.
- [14] 吴宁辛. 浅析《面纱》女主人公的爱情悲剧[J]. 文教资料, 2023(7): 9-12.
- [15] 王凯英. 浅析《面纱》中凯蒂的存在主义意识[J]. 名家名作, 2023(31): 28-30.
- [16] 桂汐盈. 浅析毛姆《面纱》中的女性成长[J]. 名家名作, 2024(3): 19-21.

A rootless study of Katie's self-consciousness in Maugham's *The Veil*

KE Xianfei*

(European University, Belgrade 101501, Serbia)

Abstract: William Somerset Maugham's "The Veil" is often interpreted under the tradition of women's coming-of-age novels, believing that the heroine Katie has achieved spiritual sublimation and growth in the suffering experience of Meitan Province. This article takes the linear narrative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proposes that Katie's awakening is a process of anti-growth. By tracing the germin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Katie's self-consciousness, this article demonstrates that Katie's awakening began with the shattering of external illusions but fell into the vacuum of inner value; Although she gained freedom of choice, she could not bear the weight of this freedom, tearing each other between desire and reason, exposing the fragility and vanity of her subjectivity. This article concludes that Katie's journey does not lead to solid self-realization but ends with a clear awareness of existence and nothingness, and her growth is unfinished and paradoxical. This "anti-growth" narrative is Maugham's pessimistic discovery of the inner dilemma encountered by modern people in their search for meaning.

Keywords: Self-awareness; There is a dilemma; Maugham; "Veil"